

「世界主義的婦人」：

晚清女報的新願景

黃 錦 珠^{*}

摘 要

晚清是中國開啟現代化的重要時期，也是政治、社會、文化、文學出現劇烈變化的關鍵時期。生逢其時的男、女知識人，開始迎向廣闊的世界，產生前所未有的世界觀。1907年，燕斌(?-?)在《中國新女界雜誌》上提出「世界主義的婦人」一說，期許中國婦女以新道德、新精神迎向世界。女知識人試圖參與時局，努力改變自我的作為，猶如在千古暗夜點燃一盞微燈，引領桎梏重重的婦女踽踽前行。本文想要探索：女報人所期盼的「世界主義的婦人」，究竟包含什麼樣的內涵？此處的「世界主義」具有什麼理念或主張？女報人的「世界主義」說或世界觀，是否有其特殊關懷或視野？

關鍵詞：世界主義、女報、《中國新女界雜誌》、燕斌、晚清婦女

^{*} 作者現為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Women of Cosmopolitanism:

New Vision and Perspective of Late Qing Woman's Periodicals

Jin-chu Huang^{*}

Abstract

Late Qing period was the pivotal moment for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lso the period for political, social, cultural, and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The intellectuals, male as well as female, began to face a new and wide world and forming a new unprecedented world perspective. In 1907, Bing Yan in *New Chinese Women Magazine* 《中國新女界雜誌》 put forth the idea of “woman of cosmopolitanism” to encourage Chinese women to welcome the world with new morality and new spirit. Female intellectuals sought to change their mindset and behavior so a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urrent affairs and adapt to the new historical situation. Their aspirations and endeavors were like a lantern in the darkness of past history, guiding women forward towards a bright future. This paper aim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o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women of cosmopolitanism,” investigate the basic ideas and claims of this concept, and map out the key concerns and perspective.

Keywords: cosmopolitanism, woman periodicals, *New Chinese Women Magazine*, Bing Yan, late Qing women

「世界主義的婦人」：

晚清女報的新願景

黃 錦 珠^{*}

一、前言

晚清是中國開啟現代化的重要時期，也是政治、社會、文化、文學出現劇烈變化的關鍵時期。生逢其時的男、女知識人，基於各自的際遇而有各自的體會與作為，不但參與了時代，也開拓了自我。1899年底，梁啟超（1873-1929）自日本乘船前往夏威夷，在太平洋途中，感懷身世與時局，於是在《清議報》上刊出了這樣的文章：

余自先世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縣，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猶了了然無大志，夢夢然不知有天下事，余蓋完全無缺不帶雜質之鄉人也。曾幾何時，為十九世紀世界大風潮所簸蕩、所衝激、所驅遣，乃使我不得不為國人焉，浸假將使我不得不為世界人焉。是豈十年前熊

^{*} 本文曾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辦之「晚清性別、文學與文化」學術工作坊上宣讀，承蒙講評人顏健富教授提供寶貴意見，又承蒙兩位匿名委員提供審查意見，謹此致謝。

子谷（熊子谷，吾鄉名也）中一童子所及料也。雖然，既生於此國，義固不可不為國人。既生於此世界，義固不可不為世界人。夫甯可逃耶？甯可避耶？又豈惟無可逃無可避而已！既有責任，則當知之，既知責任，則當行之。¹

梁啟超回顧自己從「鄉人」到「國人」又到「世界人」的平生經歷與心跡，並展顯勇於迎向世界、承擔責任的氣魄與意志。無獨有偶，1907年，燕斌（?-?）在《中國新女界雜誌》上提出「令造出一種新文明，則吾女界，庶由家族的婦人地位，進而為國家主義的婦人，更進而為世界主義的婦人」²的願景，期許婦女同胞可以擺脫傳統的家族羈絆，走出閨閣，成為直接對國家有貢獻的一份子，再成為直接對世界有貢獻的一員。面對世紀之交的變局，男、女知識人都同樣感受到：個人與外在環境之間的關係已然不同於往昔，個人必須秉持的眼界與承擔的責任也大不同於往昔。身為一個人，必須接觸與應對的，已然不僅僅局限於一家、一鄉或一國，而是囊括五洲、萬國的「世界」！這種擴大眼界、朝向世界的意志與願景，應該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呈顯於男、女知識人身上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面向。

事實上，女知識人對時局或世界的醒覺，遠比男知識人更為不易！假若沒有大力推動女權與女學，打開婦女求知與發聲的管道，像燕斌這樣的女知識人很可能無由誕生。不能忽視，清末女權思想興起，確實開啟了婦女走出閨閣、走向世界的契機。女學倡建與報

¹ 任公：〈汗漫錄〉，文中自言乃撰於「光緒25年己亥11月18日（1899年12月20日）」，刊於梁啟超、馮鏡如等編輯：《清議報》（光緒26年1月11日〔1900年2月10日〕）。見梁啟超、馮鏡如等編輯：《清議報》第35期（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頁2275。

² 煉石（燕斌）：〈留日見聞瑣談〉，《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1907年3月），頁134。作者按：本文使用的《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5期均為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下不贅述。

刊勃興，則提供了婦女追求新知以至自我發聲的公開管道。女報問世，尤可視為知識婦女參與社會、國家與世界的表徵。自1898年國人自辦第一份女報——《女學報》創刊，知識婦女擔任編輯、主筆者不乏其人，婦女報刊也以前仆後繼之姿更迭面世。³ 女報人，既是得風氣之先，同時也是開啟時代新風氣的一群婦女先覺，燕斌恰是生逢此時的先覺女報人。

燕斌期待女子有機會成為「世界主義的婦人」，與梁啟超意識到自己成為「世界人」，兩者之間的意義差距，實不可以道里計。梁啟超的醒覺，代表位居時潮先鋒的超群之士，固然值得欽敬！燕斌的期盼，猶如在千古暗夜點燃一盞微燈，引領桎梏重重的婦女踴躍前行，其可貴之處，尤不宜忽視！梁啟超是以親身經歷，實際踐履由鄉人到世界人的過程。他隨足跡所至，不但時時吸收新知，且曾確切採取行動。從公車上書、參與維新變法，到流亡日本，遠赴夏威夷，乃至策劃唐才常舉義，即使行動失敗，他至少盡一己之力，努力參與了政治、時局，企圖改變當時中國的現狀。後來他在報刊上發揮言論傳播的力量，對中國近代文學、思想與政治等各方面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⁴ 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代言論鉅子的形成，是梁氏集一身熱情與精力，長期勤勉奮鬥而來，絕非一朝一夕輕易可得。

燕斌因生平資料罕見，不清楚她早年的教育背景或經歷，但她曾自稱「奔走遍十二行省，名媛貴婦，訂交論學，相追隨而莫逆

³ 夏曉虹：〈晚清婦女生活中的新因素〉，《晚清文人婦女觀（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8-39。

⁴ 張灝著，崔志海等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

者，頗不乏人。」⁵ 可見她是位勇於突破閨閣閹限，並樂於追求知識的先覺婦女。她於1905年留學日本，成為新式知識婦女群中的佼佼者。1907年2月，她在東京創辦《中國新女界雜誌》，同時擔任中國留日女學生會對外書記，在留日女界中頗富聲望。⁶ 當她提出「世界主義的婦人」的願景時，身兼留學生、女主筆等身分。不過，除了辦報以外，她實際參與的政治、社會行動，其實相當有限，但即使有限，她仍舊拓寬了眼界，產生懷抱世界的宏闊理想！即便與男知識人的起跑點不在同一條線上，女知識人也試圖參與時局，努力改變自我。本文因此想要探索：女報人所期盼的「世界主義的婦人」，究竟包含什麼樣的內涵？此處的「世界主義」具有什麼理念或主張？女報人的「世界主義」說或世界觀，是否有其特殊關懷或視野？

歷來學界對於世界主義的討論，多著重於近現代政治思想方面，例如羅志田〈理想與現實——清季民初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互動〉、⁷ 安井伸介〈中國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探析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一種思維模式〉⁸ 等文，文學與文化方面則有王德威、季進主編《世界主義的人文視景》、陳相因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等書可供參

⁵ 煉石（燕斌）：〈羅瑛女士傳〉，《中國新女界雜誌》第5期（1907年6月），頁51。

⁶ 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國族論述與女性意識——1907年的多元呈現〉，《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206。

⁷ 羅志田：〈理想與現實——清季民初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互動〉，收於王汎森等著，王汎森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2007年），頁271-314。

⁸ 安井伸介：〈中國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探析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一種思維模式〉，《政治科學論叢》第59期（2014年3月），頁1-26。

考，⁹ 事實上，前人也早已留意晚清婦女逐漸走向世界的發展趨勢，季家珍（Joan Judge）曾指出晚清出版的外國女傑傳記，具有敦促中國婦女走向「世界性未來」（“global future”，亦可譯為「全球性未來」）的傾向。¹⁰ 然而關於世界主義如何影響晚清知識婦女，則尚未見重視。本文試圖以晚清女報人燕斌為窗口，一窺世界主義對當時新式知識婦女的啟迪，並由此觀察晚清女報的先鋒表現。

二、有關「世界主義」的倡說

「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這個詞於晚清時期開始被中國知識分子援用。它在西方歷史上可謂源遠流長，最早可上溯至公元前4世紀，即古希臘時期的犬儒學派（Cynics），後來主要有斯多葛學派（Stoics）、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人的倡說，然而它的意涵隨著時間與世界現況的發展而不斷產生變化，迄今仍存在不少學界未知的面向。¹¹ 從最基本的意義上說，早期提

⁹ 王德威、季進主編：《世界主義的人文視景》（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2019年）。陳相因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20年）。

¹⁰ Joan Judge, “Mediated Imaginings: Biographies of Western Women and Their Japanese Sources in Late Qing China,” in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ed.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Smith (Leiden: Brill, 2008), 147-66. 拙文也曾指出晚清婦女言論的內容逐漸向「國家主義」、「世界主義」拓展。參見黃錦珠：〈「婦言」的跨界與移動：以清末民初婦女報刊為觀察重心〉，《漢學研究》第36卷第4期（2018年12月），頁175-204。

¹¹ 奎邁·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著，苗華建譯：《世界主義：陌生人世界裡的道德規範》（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頁4。吉莉安·布洛克（Gillian Brock）著，王珀、丁禕譯：《全球正義：世界主義的視角》（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年），頁8。伊夫-夏爾·扎爾卡（Yves Charles Zarka）著，趙靚譯：《重建世界主義》（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頁22-28。陳相因：〈導論：

倡者認為：「世界是一個城邦，人們都是世界的公民。」¹²「世界主義」把全世界當成人類共有的一個居所，每一個人都是這個居所的公民。實際上，「世界主義」的思想內涵，頗難一言以蔽之，上述說法只是一個基本輪廓罷了。還有一個簡明且能更具體說明其核心精神的說法，可供後文參照：「世界主義認為，個人是道德關切的終極單元，有資格獲得平等的關切，不管他們的民族身份（nationality）和公民身份如何。」¹³ 這個說法或許不能將世界主義的意涵盡數囊括，但從中可以看到「個人」與「平等」在其主張內的重要性，也可以看到：與民族、國家或政治權利相關的其他身分，並不能成為區別對待的依據。這個說法雖然從「道德關切」出發，但囊括了涉及種族、政治以及社會、思想等各方面的重要因子，其中提及的平等、個人、民族（包含種族）、國家、政治等元素，也是晚清時人所談論的世界主義相關說法中，比較注重或者關係比較密切的元素。當然，有關世界主義的論述，早已突破道德範疇，在政治、經濟、社會乃至文學、文化等領域，形成各種不同的理論流脈。¹⁴ 當今世界主義的發展已經遠非晚清時期可以想像，

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沿革》，收於陳相因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頁2。

¹² 伊夫-夏爾·扎爾卡（Yves Charles Zarka）著，趙靚譯：《重建世界主義》，頁23。

¹³ 科克一肖·譚（Kok-Chor Tan）著，楊通進譯：《沒有國界的正義：世界主義、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年），頁1。下述說法類似：「每個人，不管其公民身份和其他關係如何，都擁有作為道德關懷之終極單元的全球地位，因而有權獲得平等的尊重和關心。」吉莉安·布洛克（Gillian Brock）著，王珀、丁禕譯：《全球正義：世界主義的視角》，頁14。

¹⁴ 從下列三書，可以略窺世界主義在不同領域的呈現。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埃德加·格蘭德（Edgar Grande）著，章國鋒譯：《世界主義的歐洲：第二次現代性的社會與政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科斯塔斯·杜茲納（C. Douzinas）著，辛亨復譯：《人權與帝國：世界主義的政治哲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王德威、季進主編：《世界主義的人文視景》。

唯此處並不打算以後見之明，討論晚清時人對世界主義的認知有何問題，下文想要盡量站在晚清時人的立場，說明論者當時是如何認識、理解或詮釋、應用世界主義這個西來學說，以期盡量貼近歷史事實。

至少從19世紀末開始，「世界主義」一詞便頻頻被中國知識人提及，雖然它大部分擔任的是次要或陪襯角色。例如，在梁啟超的論述中，世界主義經常被用來襯托或加強國家主義的重要性。1899年12月，梁氏發表了如下說法：

有世界主義，有國家主義。無義戰、非攻者，世界主義也；尚武敵愾者，國家主義也。世界主義，屬於理想，國家主義，屬於事實；世界主義，屬於將來，國家主義，屬於現在。¹⁵

文中世界主義與國家主義一方面是比較、並列（「理想」與「事實」）的關係，另一方面又具有前後的時序（「將來」與「現在」）關係。梁氏此說的旨要，在於提倡挽救危亡所需的愛國精神。他強調世界主義屬於未來的理想，理想雖可謂高尚、美好，但時機未到，國家主義才是屬於現在的事實，符合當前中國的需要。此說意在宣揚並提倡國家主義，然對世界主義並不予責難，即使世界主義並非當下所需，仍保留未來式的、美好的理想面貌。誠如張灝所指出的，這個時期梁氏正在「向一個早期的民族共同體的思想邁進。」「從他的觀點來看，同時接受民族國家和天下大同並不一定互相矛盾」。¹⁶ 此處所說的「民族國家」，即上文所說的「國

¹⁵ 任公：〈飲冰室自由書：答客難〉，刊於梁啟超、馮鏡如等編輯：《清議報》（光緒25年11月21日〔1899年12月23日〕）。見梁啟超、馮鏡如等編輯：《清議報》第33期，頁2139。

¹⁶ 張灝著，崔志海等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頁71、78。

家主義」，「天下大同」即上文所說的「世界主義」。羅志田也認為，在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兩者之間，「大約從1899年起，梁啟超在論及現實問題時，開始明確偏向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一邊。」

「雖然梁氏在兩主義中有明確的傾向性，但這兩主義仍在他心中縈繞不離。」¹⁷ 確實，梁氏此時雖明顯偏向國家主義一邊，但對於世界主義還不排斥。上述說法，反映了梁氏強調國家主義，同時不否定世界主義的立場。

不僅僅梁啟超而已，晚清不少知識人也對世界主義抱有好感。《浙江潮》曾刊出一篇題為〈國魂篇〉（1903）的社論，提倡「陶鑄國魂」，文中便提及：「夫一國國政之進運也，恆不外二大主義之衝突調和而後成。所謂兩大主義者何？曰世界主義與國粹而已矣。」¹⁸ 此文認為挽救國運的方法，是將世界主義與傳統國粹兩相調和。儘管文中對於「世界主義」的認識究竟如何，不易斷言，¹⁹ 但肯定與贊同的態度明顯可見。

當時人們認識或理解世界主義時，經常是透過傳統知識體系出發，尤其常見的是，將之比附為儒家所提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或擴衍至其他可相通的諸子學說。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1902）一文便指出，中國文明立足數千年而不墜的原因之一，乃是「世界主義之光大也」，此文所謂的「世界主義」，其說如下：

¹⁷ 羅志田：〈理想與現實——清季民初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互動〉，收於王汎森等著，王汎森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頁281。

¹⁸ 未著撰者：〈國魂篇〉，《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頁12。

¹⁹ 〈國魂篇〉並未詳言「世界主義」之內涵為何，僅僅提出「事無善否，惟求其適」以及「必詳察世界大勢之所趨而變易其舊俗」兩個方向，故難以追究該文對於「世界主義」的認知情況。見未著撰者：〈國魂篇〉，頁12。

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為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為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真天下也，而其理想故以全世界為鵠的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為大也。²⁰

梁氏以「平天下」的傳統說法，把孔學、墨學、老學、鄒衍等先秦諸家之思想，冠上「世界主義」這一新名詞，雖然是「舊瓶裝新酒」，卻可明白看到當時知識人從傳統學術認知出發，去理解或詮釋「世界主義」的表徵。所謂修齊治平，其實是傳統儒士修養的進路，無論是舉出「平天下」或指明「大同」，基本都以儒家思想為主。上文列舉了孔、墨、老、鄒各家，其實最常被提及的，還是儒家的天下大同說與墨家的兼愛說：

要而論之，墨子之政術，非國家主義，而世界主義、社會主義也。其言曰：「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長幼貴賤，皆天之臣也。」（法儀篇）又曰：「視人國若視其國，視人家若視其家。」（兼愛篇）舉國界、家界盡破之，而一歸於大同，是墨子根本之理想也。²¹

文中「人無長幼貴賤」所述，被視為合於平等思想，應是墨學可與世界主義連結的緣由所在。此處雖然有「世界主義」與「社會主義」混淆不清的問題，但梁啟超不只一次提到墨子之學具有世界主義精神，因此即便誤解了「社會主義」與「世界主義」的異同，

²⁰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1年第7號（1902年5月），頁57。

²¹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子墨子學說〉，《新民叢報》第3年第5號（1904年9月），頁21。

或者即便對「世界主義」的認知仍屬有限，但主張墨子之學與世界主義相關，依舊無可懷疑。從上文也可見到，無論是針對墨學或孔學，「大同」往往是共用的關鍵詞彙，故而墨子學說也被認為「一歸於大同」。可以說，從天下大同的角度去理解並接受「世界主義」新詞，在晚清時人的言論中，似乎成了一時共識。不過此處的天下大同，其實已與先秦學說所謂的天下大同有所不同。《禮記·禮運》所描述的大同乃一片祥和公正的和平世界，墨學的「兼愛」、「非攻」，著重的也是普及愛護的正面行動，對戰爭、攻伐等暴力行動採取反對而禁止的立場，但晚清出現的新名詞「世界主義」，卻時不時強調革命、破除界限等具有殺傷力的破壞行為。如上文所說的「舉國界、家界盡破之」，這一負面修辭，乃是對〈兼愛篇〉原有正面修辭的補充，然而這一簡略的補充語句，卻將類似革命行動之類的破壞性意涵暗渡了進來，也讓晚清現實中瀰漫的改革、革命氛圍滲透進來，故而「世界主義」雖然經常與天下大同兩相互作用，其內涵卻也逐漸產生裂異。

晚清局勢多變，漸漸的，有些知識人對世界主義產生了更多期待，也有些知識人開始責備世界主義不切實際。劉師培（1884-1919）可謂屬於前者，梁啟超則屬於後者。

梁啟超於1901年，就已明確批評天下一統或大同思想是不切實際的。到撰寫〈新民說〉（1902）時，他猛烈抨擊這種思想阻礙中國發展成為一個近代國家。梁氏認為，世界主義、大一統和博愛思想在道德上是崇高的，但它們與現在人類社會進步所必需的競爭價值相對立，因而是不可取的。²² 梁氏如是說：

宗教家之論，動言天國，言大同，言一切眾生，所謂博愛主義、世界主義，抑豈不至德而深仁哉！雖然，此等主

²² 張灝著，崔志海等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頁111。

義，其脫離理想界而入於現實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萬數千年後，吾不敢知，若今日將安取之？……若曰並國界而破之，無論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競爭絕，毋乃文明亦與之俱絕乎！況人之性非能終無競爭者也。……今世學者，非不知此主義之為美也，然以其為心界之美，而非歷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國家為最上之團體，而不以世界為最上之團體，蓋有由也。²³

梁氏提出此說時，清廷剛剛經歷了八國聯軍一役並簽訂賠款數額巨大的《辛丑和約》，流亡海外已數年的梁啟超，顯然更迫切感到國族的危機，也更迫切想要找到振興國勢的途徑。在此可以看到，梁氏認為競爭是確保文明進化的重要價值——於此可以看到社會達爾文主義之深遠影響。為了通過競爭獲取生存位置，梁氏反對天下大同理想而認同民族國家思想。破除國界、種界等說法，被認為屬於世界主義之內涵，既不是當前事實，也不可能輕易達成，所以國家才是「最上之團體」。「世界主義」在此，不但不合於現實之需，甚至被看做阻礙民族國家團結一體的障礙物。早先梁氏便認為「國家主義」更符合晚清的現實境況，此時更因極力提倡愛國思想而排斥「世界主義」。兩年前梁氏還頗肯定「世界主義」的理想面，這時理想面卻變成了國家的障礙。

與梁啟超不同的是劉師培。劉師培因提倡無政府主義，而對世界主義抱有好感。1905年，劉師培便曾經指稱先秦學說的派別之一為「大同學派」，並直言「大同學派，指所謂世界主義也」，同時認為「墨子亦持世界主義」。²⁴可見他也曾經透過儒家傳統的天下

²³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四〉，《新民叢報》第1年第4號（1902年3月），頁4。

²⁴ 劉光漢：〈周末學術史序·哲理學史序〉，《國粹學報》第3期（1905年3月），頁7-8。

大同去理解世界主義，並且把墨子學說看作世界主義的一員。但當時他認為中國局勢並不適合世界主義或大同之說：「以今日而欲行大同之法，非愚則誣。」²⁵ 可見他認為「世界主義」相當不符現實所需，「愚」、「誣」之形容，傳達了他的不屑與否定。不過兩年後（1907），劉師培（1886-？）與何震赴日，迅速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並在日本創辦《天義》報，這時他的認知與態度已然大為不同。²⁶ 《天義》初期〈簡章〉所列宗旨為「以破壞固有之社會，實行人類之平等為宗旨，於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種族、政治、經濟諸革命」。²⁷ 可見該報認為，為了追求「平等」，「破壞」是必然的行動，「革命」也是無可避免的，此時雖尚未見「世界主義」一詞，而宗旨所強調的「人類之平等」，其實已把握了世界主義的核心精神之一。《天義》發行初期，「女界革命」乃是首要目標，種族、政治、經濟只是兼而及之。不久後〈簡章〉修改，把「破除國界、種界，實行世界主義」列為第一條宗旨，與此同時，「實行男女絕對平等」改列於宗旨最後一條。²⁸ 即便整體來看，《天義》的宗旨並沒有改弦更張，但著重點顯然已經偏移，「世界主義」一躍而成為首要重心。同時，破壞性手段（「破除國界、種界」）也成為提倡世界主義的當然途徑之一。兩年前，劉師培曾指稱實施世界主義「非愚則誣」，此時卻轉變態度，把「實行世界主義」當做第一宗旨。梁啟超也是在兩年間，對世界主義從不排斥而到大力責難。晚清思想界變化之迅速、紛繁，於此可見一斑。

²⁵ 劉光漢：〈周末學術史序·哲理學史序〉，頁7。

²⁶ 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國族論述與女性意識——1907年的多元呈現〉，《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216。

²⁷ 未著撰者：〈簡章〉，《天義》第3卷（1907年7月）。見何震編：《天義（影印）》，收於《中國初期社會主義文獻集》（東京：大安株式會社，1966年），頁2。作者按：本文所用《天義》均據此版本，下文簡稱大安本。

²⁸ 《天義》〈簡章〉的修改，自現存第8、9、10卷合冊開始。見《天義》第8、9、10卷合冊，大安本頁174。

《天義》因主張「無政府主義」，把世界主義看成是有助於達成無政府主義目標的學說。故今人曾指：「中國無政府主義是最為提倡『世界主義』的思潮」。²⁹ 如此理解「世界主義」，包含著破壞或顛覆現有秩序的革命和暴力意涵，與訴諸和平理想的大同境界未必完全吻合。其實，對於提倡無政府主義或廢除「人治」的《天義》同人而言，革命或破壞行動，都是達成目標的手段之一，他們同時也對俄國虛無黨人的暗殺行動頗為讚揚。³⁰ 不管當時《天義》同人基於何種目的或如何理解、運用世界主義，在這樣的理解中，世界主義與破壞行動恐更難以區隔。這樣的理解，與早先通過天下大同的傳統思想而進行理解，其間的距離應是越來越遠了。

一般來說，晚清時期對於世界主義的認知，主要是從天下大同的傳統學說出發，並吸收西方傳入的平等思想，把世界主義看成強調人人平等的未來式理想境界，至於不受民族、國籍身分限制的意涵，則常被理解為破除國界、種界，因而衍生出等同於革命的破壞性手段。除了採取破壞性手段，世界主義該如何達成，晚清時人並不常提及，倒是有人曾運用現有的例證，試圖說明世界主義的實現狀態與理想精神。《萬國公報》曾刊出〈美國之世界主義〉（1906）一文，認為美國的立國精神最合乎世界主義：

凡異國之民，入籍於美國者，美國吸而收之，合同而化之，為美國人可也，初不問其來自何國，以其為世界之人也，以其為天賦之人權也，故世界主義之發達，獨美國而已矣。³¹

²⁹ 安井伸介：〈中國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探析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一種思維模式〉，頁8。

³⁰ 夏曉虹：〈晚清女報中的國族論述與女性意識——1907年的多元呈現〉，《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223。

³¹ 林樂知、范禕：〈美國之世界主義〉，《萬國公報》第214期（1906年

世界主義強調人的身分不應受國籍限制，此文認為美國接納各國移民便是合乎世界主義精神。姑不論如此理解世界主義究竟適當與否，文中將「世界主義」與當時流行的「天賦人權」說連結起來，認為「所謂天賦人權，即以世界主義為其根據。蓋以人於世界，初非一國所能限制也。」³² 無論如何，此處所強調的國籍身分不能限制一個人，這個角度確實合乎世界主義的要義。此文比較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世界主義與「天賦人權」之間的關係。「天賦人權」的主張裡面，「個人」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世界主義也重視「個人」的終極權利，但「個人」這個元素，卻是晚清時人提及世界主義之時，很少受到重視的。〈美國之世界主義〉一文所說的人籍美國之人，至少是指一個一個來自其他國家的人，此文或許有美化美國的意圖，但它也同時關注了個人在國籍之間的選擇。所謂「蓋以人於世界，初非一國所能限制也」，此中之「人」是為主詞，個人的主體性乃於此透露。其出發角度，與從天下大同說出發者，頗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的微妙存在。只不過此文旨在宣揚美國的立國精神，而非世界主義學說中的個人主體性，故而「個人」這個元素，也只能說是附帶及之而已。同時，由於晚清時人所注重的「個人」，主要是為了達成「群治」或強國的目標，缺乏維護個人權利的理論根據，不但未能在思想內涵上「強調『個人』本身之為目的，具有平等而不可放棄或讓渡的人權，更遑論從這一角度將『政治』的目的，定位為以正當的強力維護個人天賦的權利。」³³ 故而，〈美國之世界主義〉一文所指出的「個人」與「天賦人權」，雖然可說是「世界主義」核心精神之一，卻未在晚清時期引起足夠的重視。

11月），頁65-67。

³² 林樂知、范禕：〈美國之世界主義〉，頁65-67。

³³ 楊貞德：《轉向自我——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個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頁11-12。

歸結而言，晚清時人對於世界主義的認知與理解，誠然還頗有局限，然而通過世界主義這一新名詞，不但可以將先秦學說的天下大同理想，搬移到20世紀中西學說相互激盪的時代風潮之中，成為衛護傳統文化資產的可貴憑藉，還可以緩解中國國勢不振的危機感，將人人平等、天下太平之理想投射到新的未來。張灝認為：「晚清思想的一個有趣特徵是，在力圖適應因西方擴張而形成的新的世界現實中，在一些中國士紳身上出現了一種求助於天下大同哲學觀的明顯趨向。」³⁴ 這種趨向，顯然助長了世界主義一詞在晚清時期的傳播與接受。世界主義雖然不是晚清思想輿論的主流學說，卻經常在擔任陪襯或對照角色時，引起不少知識人嚮往，不論它是否合乎現實需要，仍舊都擁有美好的、理想的以及未來式希望的一面。

三、「世界主義」與理想的婦女典型

「世界主義」該如何理解，至今仍可能有各種不同的角度，相關內涵的詮釋也可能相當複雜。於晚清時期，時人初步認識其說，接受的過程難免不無偏差，但它確實曾以一種受到景仰的姿態，令晚清論者神往。即使相關內涵的認識不夠充分、完全或正確，也可能基於國族危機的現實壓力，而一度受到排斥，但大體來說，世界主義確實曾被當做一種冀望於未來的期盼與理想，是化解列強侵逼，達成人人平等或國族平等，可以追求世界祥和圓滿的願景。從前述各家說法可以發現，晚清時人所理解的世界主義，主要意涵可說是從儒家天下大同的傳統思想出發，期待一個全然無爭而平等富足的理想世界。世界主義內含的平等思想，或多或少已經被認可，而較為常見的具體說法，是把它看成破除國

³⁴ 張灝著，崔志海等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頁112。

家、種族界限的一種思想學說，這自然與晚清時期遭遇的國族危機離不開關係。無論是做為提倡國家主義的陪襯，或是做為提倡無政府主義的途徑而言，此時論者所談的世界主義，都是朝向國家體制或國民整體而立說，個人主體性即便並非完全受到忽視，也通常沒有獲得充足的重視。此時有關國家體制的問題或者所謂國民整體的概念，在大多數人的觀念中，也與婦女沒有太大關係。晚清多數論者提倡女權的目標，主要是將「分利」之人改換為「生利」之人，³⁵並期待婦女成為良妻賢母，為國家誕育優秀的國民。所謂「國民之母」，乃是救國強種論述中的一環，至於婦女獨立的個人價值或主體性，雖有少數論者提及，卻不是大多數人關注的重心。由於面對國族危機始終是晚清知識人念茲在茲的重要議題，即便當時對世界主義的理解、詮釋還不夠充分、完全，卻也是一個新觀念或一種新思想學說進入中國的歷史過程，且正是這樣的理解，影響了中國婦女的理想典型與願景。

晚清時期女權之大力提倡，主要在19世紀末的維新運動時期。變法失敗，新政受挫，女權思想則或隱或顯，始終在知識人之間流傳。辛丑（1901）年重啟新政，辦女學的熱潮重新燃起。1902年冬，蔡元培（1868-1940）與蔣智由（1866-1929）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蔣智由擔任第一任校長，他在開學典禮上發表的演說，後來刊登於陳擷芬主編的《女報》，演說內容提到三種主義及其理想的婦女典型，以此勉勵愛國女學的學生們：

今當世之論，恆曰身家主義、國家主義、世界主義。孟子曰：一鄉之士、一國之士、天下之士。若中國者，知有身家主義之國；若歐美者，知有國家主義之國。至夫世界主

³⁵ 「分利」、「生利」說，為梁啟超所提出，對晚清女權論述影響頗大。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年），頁38。

義，則當世之人，猶未足以語此也。身家主義，其圍界為至小，放而大之為國家主義，更放而大之為世界主義，吾試舉三主義之一人，以為代表可乎？³⁶

文中引述的鄉士、國士、天下士，與梁啟超所說的「鄉人」、「國人」、「世界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不少處於激變時局中的知識人，對於自身位置以及外界局勢，有相似的感受與認知。只是梁啟超之說，可謂出於自身的經驗與體認，展示了個人的自我認知與覺醒。此處蔣智由之說，宗旨在於全體國人所組成的國家，藉此提倡國家主義。蔣氏認為中國人大都只知有一人的身家，而不知有全體組成的國家，於是中國便成為「身家主義之國」，亦即缺乏國家主義。蔣氏演說的目的，既宣揚愛國精神，也呼應「愛國女學」的校名，但他的眼界不只放在國家而已，他已經將理想人格的境界擴展到全世界。

蔣氏接下來舉出三種主義的代表者：

是故木蘭者，身家主義之代表人也；貞德者，國家主義之代表人也；批茶者，世界主義之代表人也。³⁷

又說：

故夫身家主義者，可判之為已往之時代也；世界主義者，可判之為未來之時代也，而國家主義者，則為現在所當努力之時代也。³⁸

³⁶ 蔣智由：〈愛國女學校開校演說〉，《〈續出〉女報》第9期（1903年1月），頁1-4。

³⁷ 蔣智由：〈愛國女學校開校演說〉，頁1-4。

³⁸ 蔣智由：〈愛國女學校開校演說〉，頁1-4。

有關三種主義的時間預設，與前述梁啟超之說類似，都認為當前應以國家主義為務，世界主義只能期諸將來。至於三種主義的代表者，其實都被認為是對國家有貢獻的傑出婦女，但因她們立意與出發點不同，所以有了不同類別。花木蘭代父從軍，出發點是代替父親，所以被歸類於「身家主義」。貞德（Jeanne d'Arc, 1412?-1431）帶領法國軍隊抵抗英國軍隊，為國家而犧牲，故被歸類於「國家主義」。花木蘭、貞德以及下文將詳述的批茶女士，都是晚清時期著名的中外女傑。蔣智由把她們三人列為女學生典範，雖然強調「國家主義」才是現在所當努力的目標，可是文中明白列出三種主義的進展歷程，可見「世界主義」雖只能期諸未來，卻又是最為遠大、最為理想的。那麼，「世界主義的代表人」具體的表現是什麼？蔣氏說：

當批茶時，美人役使黑奴如牛馬，批茶憫之，著書言人類平等，而詆役使黑奴為非理，其書風行一時，能感動人，而黑奴卒以禁用，得脫羈絆而為自由之民。夫批茶之與黑人，不同種也，一白人而一則黑人也；不同國也，一美洲而一則非洲也，而批茶一視同仁，不分畛域，此可謂知有世界主義者矣。³⁹

「批茶」的表現之所以能代表「世界主義」，是因為她把不同種族、不同國籍的黑奴看做一律平等的人，且最後促進黑奴重獲自由。「一視同仁，不分畛域」既表現在不因種族、國籍而區別對待，也表現在促使黑奴終於獲得平等、自由的境遇。可見此處所傳達的「世界主義」，是要人人不分國、族而都能獲得自由、平等的對待。人人平等，不分種族、國籍，即是此處所強調的「世界主義」之要義。

³⁹ 蔣智由：〈愛國女學校開校演說〉，頁1-4。

文中「批茶」，今譯為「斯托夫人」（Harriet Elizabeth Beecher Stowe, 1811-1896），即晚清《黑奴籲天錄》（今譯《湯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批茶」為“Beecher”的音譯，乃其娘家父姓。1902年6月，蔣智由主編的《選報》刊出〈批茶女士傳〉一文，文中盛讚「批茶女士」透過文學之筆，拯救「無數沈淪苦海之黑奴」。⁴⁰此文譯者雖未詳，但時任主編的蔣智由顯然熟讀過，且於文末加上按語，期勉當世女子不要讓批茶「專美於前」。數月後，蔣氏再次使用「批茶」做為範例，在愛國女校開學典禮上勉勵女學生。〈批茶女士傳〉一文裡面，其實包含不少誤譯、誤解，夏曉虹〈誤譯誤讀與正解正果——批茶女士與斯托夫人〉一文辨之甚詳，此不贅述。總之，〈批茶女士傳〉刊出後，各方轉載，流傳頗廣，對當時先進先覺的知識婦女頗有影響。⁴¹這篇譯文不但明確傳達知識婦女與「世界主義」之間的關係，舉實例證明女子也可以對不同種族、國籍的世界子民發揮貢獻，更重要的是，「批茶女士」所採取著書立說的方式，不但和平，而且是當時知識婦女比較容易學習的方式。這種方式為上文提及以革命或暗殺手段破除國界、種界的說法，提供了另一種更為溫和的可能途徑。根據蔣氏之文，對婦女而言，三位代表人都是值得效仿的典範，而典範之間則有等級區別，代表世界主義的「批茶女士」即便當時尚難企及，仍舊是最高級別的理想典型。夏曉虹指出：「在批茶身上，其實傾注與寄托了晚清志士最高的女性理想，這是我們從蔣智由的話中可以得到的信息。」⁴²蔣智由以校長身分，對女學生提出的勉勵，確實是當時前所未有的遠見。

⁴⁰ 友人譯寄，觀雲（蔣智由）潤稿：〈批茶女士傳〉，《選報》第18期（1902年6月），頁4。

⁴¹ 夏曉虹：〈誤譯誤讀與正解正果——批茶女士與斯托夫人〉，收於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172-186。

⁴² 夏曉虹：〈誤譯誤讀與正解正果——批茶女士與斯托夫人〉，頁180。

蔣智由之說，為當時罕見將世界主義與婦女連上關係的說法。大部分提出世界主義的論者，關注的都是國族命運，或者是整體國民的素質，若提起國民與國族的關係，絕大多數論者也期勉男子擔負國民責任，女子則只要恪盡健身強種、相夫教子等妻、母之職即可。愛國女學一方面提倡女學，另一方面實際以宣傳革命為目標，且暗中訓練女學生試造炸藥，預備執行暗殺手段。⁴³ 基於革命需要，愛國女學對女學生的要求與訓練，遂與當時主流論述（賢母良妻論）分道揚鑣。⁴⁴ 1902年，愛國女學創辦宗旨云：

本校以教育女子，增進其普通知識，激發其權利義務之觀念為宗旨。⁴⁵

此一宗旨乍看似不特別，但若與稍後修正過的宗旨兩相比較，將更能看出不凡之處。1904年，愛國女學改良章程云：

本校以增進女子之智識體力，使有母師儀範，而能鑄造國民為宗旨。⁴⁶

宗旨修改之後，前後差異明顯可見。前一宗旨專注於女子本身的知識、權利與義務，是將女子視為獨立個體，以培育個體能力為目標。女子在此一目標之下，可能發展出屬於個人的知識、觀念，也可能直接參與社會（包含革命）行動。後一宗旨則將女子視為國家社會的一種角色，此一角色必須擔負起某些功能，展現某些外在形

⁴³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頁39。

⁴⁴ 有關主流論述賢母良妻論與其他說法之間的問題，夏曉虹業已做過翔實的考察，此不贅述，可參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增訂本）》，頁84-102。

⁴⁵ 未著撰者：〈文學小史：愛國女學校開辦簡章〉，《選報》第27期（1902年8月），頁19-20。

⁴⁶ 未著撰者：〈愛國女學校第三次改良章程〉，《女子世界》第6期（1904年6月），頁69-72。

象。所謂「母師儀範」，「鑄造國民」，要求的是女子為人母、為人師的社會角色，而不是女子個人的主體表現或作為。雖然愛國女學後來的宗旨改變了，但創辦初期，卻是以培育女子個人能力為主。蔣智由的演說詞恰恰展現了對婦女本身的勉勵與期許。演說詞所舉出的三位女傑，雖有層次高低之別，卻都是以婦女自身的作為表現為準據，而不是以某種社會角色為依歸。

蔣智由的說法曾經產生過什麼影響，是否為燕斌說法之依據，至今恐難以查考。不過蔣智由的演說詞刊登於《女報》，而《女報》於當時相當聞名且發行量大。《女報》初期隨《蘇報》附送，因大受歡迎，自第3期開始，除繼續增送《蘇報》的長期閱戶外，其他讀者可以另資專購。自第7期開始停止贈送，這時專購《女報》的讀者數量，已經達到千人以上。蔣智由的演說詞刊登於《女報》第9期，此為以「女報」之名發行的最末一期。下一期《女報》改名《女學報》，且擁有獨立報館，不再依附於《蘇報》館。可見營利所得，足以奠定報館獨立經營之所需。蔣智由說法可謂為當時婦女言論之先鋒，以《女報》當時受歡迎的程度，有機會讀到此說的讀者當也不在少數。燕斌曾自稱「奔走遍十二行省」，⁴⁷ 她很可能直接或間接接觸過蔣智由之說。當然，即使曾經接觸過，也不能代表接受其說，若非具備相似理念，前人的說法恐未必能對後人造成影響。

無論如何，蔣智由勉勵女學生的演說詞，為「世界主義」的流播與理解，打開了一扇新窗。同時也讓中國婦女的理想典型，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1903年，兩本題名「世界女傑」的書前後問世，讓婦女與「世界」的關係有了另一種具體的結。

根據夏曉虹的考察，1903年2月出版的《世界十二女傑》，乃首開晚清女子新傳出版之風。《世界十女傑》緊隨其後推出。《世界十二女傑》譯自日本岩崎徂堂、三上寄風所著同名之書，《世界十女

⁴⁷ 煉石（燕斌）：〈羅瑛女士傳〉，頁51。

傑》未標作者名，但很可能是一部原創作品。二書所收女子傳記，皆為世界（西方）各國名媛，從王室貴女到女事業家、提倡女權的女運動家都有。⁴⁸ 這些新型女傑，再也不是烈女、才女，而是女豪傑與女英雄。⁴⁹ 蔣智由提及「國家主義之婦人」貞德的傳記，就收在《世界十二女傑》一書裡面。⁵⁰ 《世界十女傑》出版後，《女學報》主編陳擷芬親自執筆，改編為白話演義體，刊登於《女學報》上，並在前言勉勵同胞姐妹學習仿效，「也做一個女豪傑出來。」⁵¹ 此處所謂「女豪傑」，是期許婦女以自身作為參與世界，而非當時主流論述所提倡的母儀妻範。可見西方女傑傳記的出版，對當時中國婦女而言，提供了與傳統大不相同的行為、人格典範，頗具振聾發聵之效。「女豪傑」之說，稍後也成為提倡女權者所標舉的理想典型。1904年，《女子世界》刊出〈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⁵² 文中極力推崇花木蘭之勇武、愛國，藉以宣揚民族主義精神。《中國新女界雜誌》也曾刊出一首詩，稱讚花木蘭：「從軍事業空古今，歐美名媛讓未遑。」⁵³ 認為歐美名媛都比不上她。花木蘭之從軍，一方面吻合當時論者提倡的尚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以自身的力量報效國家，可說是婦女以個人作為貢獻家國之顯例，代父之舉同時又恪盡孝道，符合傳統倫常規範，無論公、私或新、舊，她都成為論者樂意標舉的女傑形象，上述蔣智由舉之為「身家主義之婦人」的代表，也是出於類似考量。⁵⁴ 無論是從「身家主義」立論，還是從「女豪傑」著眼，花木

⁴⁸ 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38-45。

⁴⁹ 季家珍（Joan Judge）著，楊可譯：《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211-212。

⁵⁰ 參見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45。

⁵¹ 因《女學報》停刊，此文僅刊出一回，未完。楚南女子（陳擷芬）：〈世界十女傑演義〉，《女學報》第2年第4期（1903年10月），頁55。

⁵² 亞盧（柳亞子）：〈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頁25-32。

⁵³ 保素：〈詠史四首〉，《中國新女界雜誌》第3期（1907年4月），頁132。

⁵⁴ 有關花木蘭事蹟的詮釋，晚清時期至少有兩種方向。例如蔣智由顯然較重視「代父」所表現的孝道，柳亞子則刻意強調「從軍」之勇武、愛國表現。

蘭所展現的作為——親身奔赴戰場，其實都已超越絕大部分傳統婦女所能及的域限。

歸納言之，從世界女傑到足以傲視「歐美名媛」的女豪傑，隱隱可以看到，婦女越來越向「世界」靠近。中國的婦女典範，一方面試圖向西方取經，另一方面也努力建立自身的歷史傳承。這時候女子的人格理想，不僅不再受限於閨閣、家庭，更且企圖超越國界，站上世界舞台！蔣智由於1902年便以「世界主義的婦人」為最高期許，較當時論者更早指出前景，不能不說他確實是一位眼光高遠的先鋒。

不能否認的是，愛國女學創辦之初，有意培育革命同志，特別注重女學生的個人知識與能力，革命大旗在此形成了保護婦女個人主體性的屏障，稍後蔣智由、蔡元培等人因事去職，愛國女學的革命色彩逐漸消褪，辦學宗旨也隨之轉向。可以發現，革命目標一旦失去，婦女主體也同時消亡，⁵⁵ 可見救亡圖存始終是主導婦女運動走向的一大主因，晚清婦女的主體位置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巨潮中，或顯或隱的一步一步形成。

19世紀末興起的諸多女權主張或思想，最初大都出自男知識人之提倡、號召，目的在於配合當時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以強種強國，培育新一代國民為宗旨，即所謂賢母良妻主義。這個目的，忽視女子本身的權利與意願，這樣的婦女運動，忽視了婦女個人的主體性，實在稱不上是完善的婦女運動。⁵⁶ 這種情形，有待婦女自身投入、實際參與才能改善。中國婦女運動便是在投身其中的婦女人數大大增加以後，開啟了新階段，這大約是進入20世紀的時候了。

兩者詮釋各有偏重，乃因各自立場不同所致。詳可參季家珍（Joan Judge）著，楊可譯：《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頁171-175。

⁵⁵ 自晚清至五四時期，婦女運動始終脫不開救國主流，而以婦女自身做為一個獨立自主的「人」的要求，卻往往不受重視。鮑家麟等著，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頁254。

⁵⁶ 鮑家麟等著，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頁72-73。

四、「世界主義」與中國婦女的願景

1907年2月5日，燕斌在東京創辦《中國新女界雜誌》，是晚清第一份在海外創辦的女報。⁵⁷雜誌以「新」為名，一方面是晚清流行風潮的顯現，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創辦者求新求變的意旨。主編燕斌當時是一位醫科的女留學生，同時擔任中國留日女學生會對外書記。《中國新女界雜誌》極力提倡、強調「女國民」，燕斌曾明白表示：

本社最崇拜的就是女子國民四箇大字。本社創辦雜誌的宗旨，雖有五條，其實也只是這四箇大字。⁵⁸

「女國民」（或「女子國民」）重視的是女子自身的權利、義務，包括個人意願，與當時流行的賢母良妻主義不同。賢母良妻的說法，雖有提升當時女子價值與地位之功，卻也不免有視女子為工具的弊端。燕斌曾以歐美為例，說：

歐美諸強國，深知其故，對於女界實行開明主義，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愛國之理想、國民之義務，久令灌注於腦筋，故其女國民，惟日孜孜以國事為己責，至於箇人私利，雖犧牲亦不之惜，斯其國始得為有民。宜其國勢發達，日益強盛，而莫之能侮。⁵⁹

女子可與男子接受同等的教育，同盡國民之義務，這在晚清當時，是尚未能達成的夢想。《中國新女界雜誌》創辦的同一年，清廷才

⁵⁷ 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118。

⁵⁸ 煉石（燕斌）：〈本報對於女子國民捐之演說〉，《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42。

⁵⁹ 煉石（燕斌）：〈發刊詞〉，《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1。

將女子教育納入正式教育軌制。當年頒布的女學堂章程，僅設置八年女子小學與四年女子師範學堂兩種等級，男子所享有的中學、實業、專門及大學教育，女子均無權享受。⁶⁰ 燕斌此文所說「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確實是當時中國女子還無法企及的美夢，其超越時代的見識，於此可見一斑。由於燕斌主張培育「女國民」，《中國新女界雜誌》譯介的歐美女子去除了良妻、孝女一類家庭楷模，同時有意識排斥明治時期日本流行的「賢母良妻」主義，而將目標置放於愛國女傑、女政治家身上。⁶¹ 例如雜誌也曾關注過美國黑奴解放運動，刊登了一位大力支持廢除黑奴制度的女演講家的傳記，即〈博愛主義實行家墨德女士傳〉。墨德女士（Lucretia Mott，今譯「柳克麗霞·莫特」，1793-1880）曾擔任「反對奴隸制度婦人同盟會」的會長，她利用自己的口才，四處演講，宣傳廢奴主張，⁶² 與「批茶女士」相類，也是一位以和平方式有助於黑奴解放的知識婦女。

由「女國民」的主張可以發現，燕斌較同時代人更重視婦女的自身權益、個人意識與主體性。身為知識婦女之一員，燕斌對於婦女的處境與前途，既有更為貼切的體認，也有更為深遠的期冀。下列說法，應該也是以這樣的認知為基礎：

奉告女同胞，吾輩此後求學之方針，其物質上的學問，及日本之美俗，不妨近取諸東洋以醫痼疾，而精神上的教育，則斷宜以歐美為師，而鍛冶以最純潔高尚之理想，使相化合，令造出一種新文明，則吾女界，庶由家族的婦人地位，進而為國家主義的婦人，更進而為世界主義的婦人矣。⁶³

⁶⁰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頁33。

⁶¹ 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124。

⁶² 未著撰者：〈博愛主義實行家墨德女士傳〉，《中國新女界雜誌》第5期（1907年6月），頁41-50。

⁶³ 煉石（燕斌）：〈留日見聞瑣談〉，頁131。

當時留學於日本的燕斌，不但深知中國婦女教育的流弊，也已看到日本婦女教育的不足，因此她雖然認為日本有值得學習的一面，但絕不能以為滿足，必須更進一步，向歐美學習。學習歐美的目的，乃在於造出「一種新文明」，可以讓婦女從家族走向國家，再走向世界。「世界主義的婦人」不但傾注了當時最高的婦女理想，而且由知識婦女自身提出，反映的是婦女個人的醒覺，展示婦女個人參與世界的潛力以及發展自我的無限可能。

《中國新女界雜誌》上並沒有太多文字詳述「世界主義的婦人」之內涵，不過燕斌的思路與期盼，依舊有跡可循。該刊第1期第一篇論著專文，為燕斌親自執筆之〈女權平議〉，⁶⁴此文位於創刊號上開篇首發位置，可見女權乃此刊極度重視之議題。第二篇為巾俠（?-?）〈女德論〉，文中有句云：「吾輩欲與男子權利平等，必自道德與男子平等始。」⁶⁵明白指出提倡女權的實質內涵是提倡女德。文中極力指陳「女子無才便是德」舊說之不當，也極力排斥以靜順為女德的舊傳統，並主張好好培育女子的「公德」：

吾國識者，恆太息於國民之柔蔽私愚，不識公德為何物。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其母既伏閉閨中，靜順為德，其子安得不柔蔽私愚者。英婦之德多醇，故其民沉毅；法婦之德多達，故其民活潑；美婦之德多慈善，故其民平和；吾國婦人之德多靜順，故其民柔蔽私愚。⁶⁶

此文所謂「女子者國民之母」的說法，表面上與燕斌提倡的女國民並不相同，但文中主張女子必須培養新的「公德」，並且以列強諸國為例，強調女子德行影響全國民風，極力彰顯女子本身的表現與

⁶⁴ 煉石（燕斌）：〈女權平議〉，《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1-6。

⁶⁵ 巾俠：〈女德論〉，《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9。

⁶⁶ 巾俠：〈女德論〉，《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9。

可能貢獻，其立場並非當時「賢母良妻」之說所能範限。以「公德」為重的新女德，當也是《中國新女界雜誌》嘗試要建立的「新女界」的人格內涵之一。⁶⁷ 此文提出的新女德包含「慈愛」、「高尚」、「俠烈」、「勇毅」四者，並舉出實例為證，⁶⁸ 其中有關「慈愛」的說明如下：

慈愛 法之貞德，愛及亡國者也。美之披茶，愛及異種者也。加彭他之感化院，愛及罪囚者也。奈挺格爾之赤十字旗，愛及敵人者也。……蓋女子之為，多趨於世界大同，男子之為，不過一身是利，大亦及於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而止耳。感化院之功，徧被於囚犯，赤十字旗之影，永照於地球，則女德巍然，男子將望拜下風。我諸姐妹，其有意乎？⁶⁹

文中認為女子「慈愛」的道德表現，可以推及「異種」、「罪囚」與「敵人」，趨近於「世界大同」的精神，遠比男子只關注一身或帝國、民族要偉大多了！上文曾提及，晚清時人理解「世界主義」，多數從傳統儒家「世界大同」之說進入，此處認為「慈愛」的女德表現「多趨於世界大同」，也就是用另一種說法，說明慈愛的德行可以達致世界主義的精神，且所舉實例中，「批茶夫人」恰恰是蔣智由所說「世界主義之婦人」的代表者。此文雖然沒有明指「世界主義」一詞，然而文中提倡的新女德之一：「慈愛」，卻是符合世界主義理想的。

巾俠之說並未特別關注「世界主義」的主張，故而未曾直接指明新女德與世界主義的關係，燕斌則因期許婦女以「世界主義的婦人」為理想目標，遂大力呼籲推擴女子道德：

⁶⁷ 鄧沛力：《形構「女界」：從《中國新女界雜誌》論晚清女性國族主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7月），頁63-68。

⁶⁸ 巾俠：〈女德論〉，頁13-14。

⁶⁹ 巾俠：〈女德論〉，頁13-14。

道德者，女子立身之要素。提倡女學者，所尤當注重者也。德有公私，實有相互之關係。自人權進化，女子道德問題，由個人主義進為國家主義，更進為世界主義。世界主義者，推個人私德普及於世界也，國家主義者，推個人私德普及於國家也。吾女界今日正由個人主義與國家主義過渡之時代，然如私德不完全，則如木之無本，水之無源，其國家主義之公德必不發達，有斷然者。……本斯品詣，推斯志願，將來吾中國女界，必可企及於世界主義之地位，生黃種之色，壯東亞之光，彼美國第二救世主無冠女帝其人者，不得專美於前。⁷⁰

文中主張提倡女學必須注重道德，同時將道德的公、私兩面結合起來，認為個人私德可以推展到國家，也可以推展到世界，然後達到「世界主義」的理想位置，並成為黃種人與全亞洲之光。此一說法不但呼應巾俠〈女德論〉所提倡的「公德」，而且將「私德」與「公德」連結起來，認為以私德為根據，可推廣而成就公德，據此，由個人而國家而世界，遂成為可能且可行之途徑。這個說法，頗有儒家傳統思想「修身治國平天下」的影子，但其中添加了諸多新思想，眼界與抱負遠遠超過儒家舊說。燕斌此說可貴的是，「世界主義」實質上是以道德為內涵，在晚清各種有關「世界主義」的論述中，最為接近現代「世界主義」之定義，也最為靠近「個人」主體，可說具有超越時代的洞見。

除了上述見於文字的論述，《中國新女界雜誌》還有其他方面的表現值得注意，除了上文提及的刊載歐美女傑傳記之外，還有封面設計以及報導世界各國婦女運動的消息。

⁷⁰ 煉石（燕斌）：〈可敬哉京師四川女學堂之學生，可敬哉中國婦人會之書記〉，《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1907年3月），頁140-142。

《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封面畫的是一位女子捧讀書卷（詳圖1），⁷¹第2期的封面改為一飛翔狀的女子（或女神）雙手捧著地球（詳圖2），也是在這一期的雜誌上，燕斌發出「更進而為世界主義的婦人」的豪語。第1期封面的圖樣，可以說呼應了當時「興女學」的主張，既期許婦女樂學不倦，也期許報刊成為傳遞新知的載體。第2期的封面圖樣頗具隱喻作用，顯示燕斌的眼界與雄心均更上一層，冀盼女子可以掌握並推動全地球。這一期雜誌所提出的「世界主義」，是一個可以涵括全球的意識或概念，封面設計的圖樣，可謂隱示了婦女的行動目標與理想。第3期封面與第2期類似，也是一位飛翔女神雙手捧著地球的圖樣（詳圖3）。這兩期的封面圖像，都隱喻了婦女參與世界、扶持全球的意志與願景。女子的飛翔動作，隱喻推動全球前行的力量，來自婦女本身的行動。除了暗示婦女可以成為全球前進的重要動力外，也可以理解為：必須仰賴婦女的參與，全球才能有飛躍般的進步。第4期封面，畫的是一位女子（或女神）穩坐於地球之上的圖樣（詳圖4）。女神一手放置身前腿上，另一手置於身側，手掌張開，放在地球球面上，宛如照拂、衛護或掌握著全地球，同時女神的髮髻高高突出於封面圖框之上。此一圖像充分展示出女子（或女神）崇高無上的形態，這應該是期許婦女達成「世界主義」理想之後的狀態。第1期封面的女子髮型、衣著，接近日本女子，可說呼應了部分婦女教育可向日本學習的意旨，第2、3期封面的女子，髮型與衣著則近似西洋女子，隱隱應和「精神上的教育，則斷宜以歐美為師」的主張。圖像上女子飛翔的姿態，也暗示屬於婦女的更為自由且開闊的行動方式與空間。第4期封面的女子，較接近中國傳統的髮型與服飾，暗示屬於中國獨有或特有的婦女理想典型，期許中國婦女可以成為衛護全球的主人公。封面女子的變化，似也隱示中國新式婦女的演進過程：

⁷¹ 各期封面可見於1977年幼獅版《重刊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至5期。



圖1 《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封面



圖2 《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封面



圖3 《中國新女界雜誌》第3期封面



圖4 《中國新女界雜誌》第4期封面

從學習日本婦女的讀書、求學出發，進而模仿西方婦女，再進而完成中國婦女自身的地位建構。穩坐於地球之上，顯然是完成了「世界主義的婦人」的理想。

基於將眼光放大至全世界的理念意涵，並且認為歐美才是婦女精神教育值得仿效的對象，《中國新女界雜誌》除了選譯歐美女事業家、女政治家為女傑典範以外，每期還都報導了歐美乃至世界各地婦女界發生的事況或新聞，例如〈美國女界之勢力〉、〈英國婦人爭選舉權〉、〈英國婦人爭選舉權彙記〉、〈澳洲婦人之勢力〉等文。⁷²〈歐美女子之教育〉一文，自第3期連載至第6期停刊為止，且預告將出版專書，⁷³可見燕斌的理念，始終貫穿於雜誌之上。

由燕斌提出的「世界主義的婦人」之說法，不僅僅承續了晚清志士最高的女性理想，而且是婦女自身基於個人的認知意識與自我醒覺，自覺的提出參與社會、改造世界的願景。基於這樣的願景，《中國新女界雜誌》比當時其他女報，更留意世界各地婦女權益的進展，也更留意世界各國婦女的事況報導。「世界主義的婦人」雖是一個只能期諸將來的新願景，燕斌卻以一己之力，利用雜誌的內容，嘗試開拓眼界，留心世界，為將來進行準備。

⁷² 煉石（燕斌）：〈美國女界之勢力〉、蘭馨：〈英國婦人爭選舉權〉，《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79-82、97；煉石（燕斌）：〈美國女界之勢力〉、轉坤：〈英國婦人爭選舉權彙記〉、轉坤：〈澳洲婦人之勢力〉，《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1907年3月），頁95-98、99-102、103-104。

⁷³ 媯魂：〈歐美之女子教育〉，《中國新女界雜誌》第3至6期（1907年4-7月），頁39-46、79-90、79-88、71-84。第6期雜誌文本承蒙衣若蘭教授慨贈，謹此致謝。

五、結語

基於晚清時期救亡圖存的現實需要，「國家主義」經常是男、女知識人大聲疾呼、極力倡說的思想主張，然而站在國家立場，要求婦女擔負為人妻、為人母職責的同時，不免有忽略婦女做為「人」的基本權利的缺失。為了紓解或緩和「國家主義」對婦女權益的收編、消滅，甚或壓榨、剝削，「世界主義」似乎遠比「國家主義」更有利於婦女。晚清論者大多數都不否定國家主義的重要性，而是把個人或身家、國家、世界，看做三種層進式的發展階段，無論在男知識人或女知識人的期待架構中，「世界主義的婦人」都屬於最高級理想。當燕斌提出這個願景時，婦女個人的主體性乃成為不可或缺的基石，其中所映示的女權思想的高度，至少在婦女主體意識的價值展現上，是其他論者或主張所不能望及。燕斌「女國民」之說，是晚清時期少數認可婦女個人主體價值的主張，她所提出「世界主義的婦人」的冀盼，也是晚清女報上少見的期待婦女發揮個人價值，直接參與世界、發展自我的主張。即使這個主張沒有立即發展成大眾熟悉的流行說法，但放眼20世紀到21世紀的今天，婦女的權利、地位走向，似乎正默默朝著這個方向匍匐前進。燕斌的主張，應有其歷久彌新的意義。

徵引書目

- 巾 俠：〈女德論〉，《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7-17，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新民說四〉，《新民叢報》第1年第4號，1902年3月，頁1-12。
-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新民叢報》第1年第7號，1902年5月，頁53-66。
- 中國之新民（梁啟超）：〈子墨子學說〉，《新民叢報》第3年第5號，1904年9月，頁16-21。
- 友人譯寄，觀雲（蔣智由）潤稿：〈批茶女士傳〉，《選報》第18期，1902年6月，頁4。
- 王德威、季進主編：《世界主義的人文視景》，鎮江：江蘇大學出版社，2019年。
- 未著撰者：〈文學小史：愛國女學校開辦簡章〉，《選報》第27期，1902年8月，頁19-20。
- 未著撰者：〈國魂篇〉，《浙江潮》第1期，1903年2月，頁1-18。
- 未著撰者：〈愛國女學校第三次改良章程〉，《女子世界》第6期，1904年6月，頁69-72。
- 未著撰者：〈博愛主義實行家墨德女士傳〉，《中國新女界雜誌》第5期，1907年6月，頁41-50。
- 未著撰者：〈簡章〉，《天義》第3卷，1907年7月。何震編：《天義（影印）》，收於《中國初期社會主義文獻集》，東京：大安株式會社，1966年，頁2。
- 任 公：〈飲冰室自由書：答客難〉，《清議報》第33期，1899年12月。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7年，頁2139-2140。
- 任 公：〈汗漫錄〉，《清議報》第35期，1899年12月。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67年，頁2275-2283。

- 伊夫－夏爾·扎爾卡（Yves Charles Zarka）著，趙靚譯：《重建世界主義》，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
- 吉莉安·布洛克（Gillian Brock）著，王珀、丁禕譯：《全球正義：世界主義的視角》，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年。
- 安井伸介：〈中國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探析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中的一種思維模式〉，《政治科學論叢》第59期，2014年3月，頁1-26。
- 何震編：《天義（影印）》，收於《中國初期社會主義文獻集》，東京：大安株式會社，1966年。
- 亞盧（柳亞子）：〈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頁25-32。
- 季家珍（Joan Judge）著，楊可譯：《歷史寶筏：過去、西方與中國婦女問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年。
- 林樂知、范禕：〈美國之世界主義〉，《萬國公報》第214期，1906年11月，頁65-67。
- 保素：〈詠史四首〉，《中國新女界雜誌》第3期，1907年4月，頁131-132，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 奎邁·安東尼·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著，苗華建譯：《世界主義：陌生人世界裡的道德規範》，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
- 科克一肖·譚（Kok-Chor Tan）著，楊通進譯：《沒有國界的正義：世界主義、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重慶：重慶出版社，2014年。
- 科斯塔斯·杜茲納（C. Douzinas）著，辛亨復譯：《人權與帝國：世界主義的政治哲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夏曉虹：《梁啟超：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
- 夏曉虹：《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 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
- 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埃德加·格蘭德（Edgar Grande）著，章國鋒譯：《世界主義的歐洲：第二次現代性的社會與政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嫫 魂：〈歐美之女子教育〉，《中國新女界雜誌》第3至6期，1907年4-7月，頁39-46、79-90、79-88、71-84，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 張灝著，崔志海等譯：《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
-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年。
- 陳相因主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20年。
- 黃錦珠：〈「婦言」的跨界與移動：以清末民初婦女報刊為觀察重心〉，《漢學研究》第36卷第4期，2018年12月，頁175-204。
- 楊貞德：《轉向自我——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上的個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
- 楚南女子（陳擷芬）：〈世界十女傑演義〉，《女學報》第2年4期，1903年10月，頁55-58。
- 煉石（燕斌）主編：《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6期，1907年2-7月。
- 煉石（燕斌）：〈發刊詞〉，《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1-3，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 煉石（燕斌）：〈女權平議〉，《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1-6，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煉石（燕斌）：〈本報對於女子國民捐之演說〉，《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41-50，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煉石（燕斌）：〈美國女界之勢力〉，《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79-82，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煉石（燕斌）：〈美國女界之勢力〉，《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1907年3月，頁95-98。

煉石（燕斌）：〈留日見聞瑣談〉，《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1907年3月，頁131-134，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煉石（燕斌）：〈可敬哉京師四川女學堂之學生，可敬哉中國婦人會之書記〉，《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1907年3月，頁135-142，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煉石（燕斌）：〈羅瑛女士傳〉，《中國新女界雜誌》第5期，1907年6月，頁51-54，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劉光漢：〈周末學術史序·哲理學史序〉，《國粹學報》第3期，1905年3月，頁7-8。

蔡元培：《蔡元培自述》，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1年。

蔣智由：〈愛國女學校開校演說〉，《（續出）女報》第9期，1903年1月，頁1-4。

鄧沛力：《形構「女界」：從《中國新女界雜誌》論晚清女性國族主義》，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7月。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鮑家麟等著，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

轉 坤：〈英國婦人爭選舉權彙記〉，《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1907年3月，頁99-101，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轉 坤：〈澳洲婦人之勢力〉，《中國新女界雜誌》第2期，1907年3月，頁103-104，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 羅志田：〈理想與現實——清季民初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關聯互動〉，收於王汎森等著，王汎森主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2007年。
- 蘭 馨：〈英國婦人爭選舉權〉，《中國新女界雜誌》第1期，1907年2月，頁97，1977年臺北幼獅文化公司影印重刊本。
- Judge, Joan. "Mediated Imaginings: Biographies of Western Women and Their Japanese Sources in Late Qing China." In *Different Worlds of Discourse: Transformations of Gender and Gen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edited by Nanxiu Qian, Grace S. Fong, and Richard Smith, 147-66. Leiden: Brill, 2008.